

叶林生 著



古帝传说

与华夏文明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古帝传说

与华夏文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叶林生著.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4

ISBN 7-5316-3593-3

I. 古… II. 叶… III. 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787 号

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

叶林生 著

责任编辑:程俊仁

封面设计:付 旭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0.875·字数 260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200

ISBN 7-5316-3593-3/K·83 定价(平):15.00 元

序

安作璋

如何看待古帝传说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是近些年来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先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已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问世。

对待古帝传说,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古代史家大都认为自《左传》、《国语》以来形成的古史系统基本真实可信。清代崔述以及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对古史系统提出怀疑。后来又出现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以三皇五帝为核心的古帝传说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些传说是后人编造的产物,不足为信,以为“东周以上无史”。可以说,两者各有所长;但也都有其偏颇之处,他们都对古帝传说的认识绝对化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指导下,一些学者利用考古资料、民族和民俗资料等来验证传说资料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起来说,在先秦史的研究中,这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由于资料的相对缺乏,如何对其突破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对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进入文明的地区、关于文明起源的途径等都有不同的观点。除了运用已出土的考古资料外,如何对古帝传说进行验证和梳理考证,探求其可信的成份,以此为线索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应是突破这个问题的关键。对此,叶林生同志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近些年来，叶林生同志一直潜心研究古帝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先后有《伏羲考》、《黄帝考》、《炎帝考》、《共工考》、《华夏考》等十余篇学术论文问世，在史学界有很大反响。同时，他又以很大的毅力写成了这部《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本书在运用史料方面，注重史料的源流，避免了简单的归纳综合；同时又避免了对古代传说一概否定或将传说人物简单合并的弊病。作者在将古代传说与地下考古史料结合方面，突破了以往简单的“相加法”，以考古学所揭示的原始宗教遗迹为依据，更增加了说服力。书中不乏独到的见解，如：作者认为，从中国由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过渡的必然历程、由英雄史观形成的过程等方面来看，古代神本文化时期实不能产生出高于神或与神并肩而立的“英雄祖先”。作者从原始宗教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由氏族到国家的演进历史，从战国中期之前的较原始的传说中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来探索文明起源的途径，不拘泥于“中原中心说”，指出了文明起源应到典型的龙山文化和与之相邻的红山文化中去寻找等等。这些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叶林生同志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详细占有资料、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作者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和在学术研究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我相信叶林生同志以后在这个领域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有感于叶林生同志的研究成果和进取精神，谨草拟数语，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七月



目 录

序·····	安作璋(1)
绪论·····	(1)
(一)研究的缘起·····	(1)
(二)研究的指导思想·····	(6)
(三)正确使用古代传说资料·····	(12)
(四)如何研究古代传说中的古帝·····	(18)
第一章 “三皇”探源·····	(23)
(一)自古“三皇”有几人·····	(23)
(二)燧人氏探踪·····	(27)
(三)伏羲氏寻源·····	(30)
(四)神农氏访真·····	(42)
(五)三皇的文化意义·····	(46)
第二章 五帝说解析·····	(53)
(一)历史学领域中的五帝说·····	(53)
(二)神学领域中的五帝说·····	(59)
(三)五帝说与古帝传说的意义·····	(66)
(四)五帝的时间定位·····	(76)
第三章 中国的古代部族·····	(81)
(一)五六千年前的中国部族·····	(81)
(二)远古中原部族考·····	(88)
(三)华夏及华夏族的起源·····	(96)
(四)古代部族与古帝传说·····	(107)

第四章 炎帝、祝融与火崇拜	(109)
(一)炎帝是原始宗教中的火神	(109)
(二)炎帝的故乡何在	(113)
(三)祝融的本相及氏族渊源	(120)
(四)炎帝与祝融传说的文化意义	(124)
第五章 女娲、帝喾与图腾崇拜	(129)
(一)女娲的真相及氏族渊源	(129)
(二)女娲与帝喾	(141)
(三)帝喾与帝俊、帝舜	(149)
第六章 黄帝与生殖崇拜	(154)
(一)关于黄帝传说的综述	(154)
(二)关于黄帝传说的思考	(161)
(三)黄帝真相考	(167)
(四)黄帝的氏族渊源	(173)
第七章 帝俊——商人的图腾祖先	(184)
(一)帝俊——古东夷部族的图腾神	(184)
(二)帝俊与帝舜	(191)
第八章 太昊、少昊与日神崇拜	(200)
(一)关于太昊的传说	(200)
(二)关于少昊的传说	(205)
(三)关于太昊、少昊传说的几个问题	(215)
第九章 帝颛顼与月神崇拜	(221)
(一)颛顼是神还是人	(221)
(二)颛顼是什么神	(226)
(三)颛顼传说释义	(231)
(四)颛顼与“绝地天通”	(237)
(五)颛顼的氏族渊源	(242)

第十章 共工与河水崇拜·····	(247)
(一)共工的本相是神·····	(247)
(二)共工是什么神·····	(255)
(三)共工的氏族渊源·····	(259)
第十一章 尧舜与田土崇拜·····	(265)
(一)帝尧传说的始末·····	(265)
(二)帝尧之真相·····	(272)
(三)尧舜禅让说渊源·····	(278)
(四)尧舜之氏族渊源·····	(283)
第十二章 禹与夏人的社神崇拜·····	(289)
(一)禹传说的演变·····	(289)
(二)禹的本相是田土之神——社神·····	(295)
(三)禹与后土及鲧的关系·····	(298)
(四)鲧禹的氏族渊源·····	(302)
第十三章 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	(310)
(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理性思考·····	(310)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地区(上)·····	(315)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地区(下)·····	(321)
(四)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和途径·····	(327)
后记·····	(337)

绪 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这已为世界所公认。

如何阐述我国的文明起源史?迄今为止,摆在世人面前的还是两部互不相关的“史册”:一部是由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编辑而成的,这固然是中国具有古老文明的最充分、最有力的证据,但因这部地下史册是物化的,无字又无声,因而,对于我国大多数民众来说,影响并不大。诸如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以及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古文化的内涵,大抵只能在教科书或专门的研究书刊中才能见到,国人所知甚少。另一部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古代士人集体编纂、以三皇五帝为座标的文明起源史。经两千数百年的传播,三皇五帝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源远流长的代用语,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并深深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站在三皇五帝脚下,面对着丰富的地下史料,自然会产生一个念头: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古文化遗存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着怎样的关联?如何寻找两部脱节的文明起源史的结合点?

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的缘起

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它对于正确阐

述我们民族由氏族到国家的途径、历程、动力,对于破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旧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着手从古代传说与地下史料的结合方面进行研究,一批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取得了不少成就。这些成就中,确有不少专家采取了严肃的、科学的态度,让人们看到了解开历史之谜的曙光。但另一些论著则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即立足于地下史料和传说资料双重确切性的基础上,或以地下史料附会于传说,或以传说为据求证于地下史料。有的学者以传说中的炎帝、黄帝的“发明创造”与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相对照,从而得出结论,肯定这些文化都是炎帝部族所创造,进而推论:“炎帝的功绩是可信的。”同时认为,仰韶文化即属于黄帝氏族的文化,“古籍对黄帝业绩的记载不是子虚乌有”。也还有人认为早于仰韶文化的裴李岗文化是少典部落创造的文化。这些论著完全沿袭了自《左传》、《国语》以来所逐渐形成的古史系统。所谓从地下史料与传说资料的结合方面研究古代文明起源史,成了地下史料与传说的简单相加。我无意于去苛责这种做法,但作为科学研究,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审察:这种“相加法”是否科学?能否反映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史?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主要不取决于地下史料,因为大量地下史料已昭然于世,它向世人表明:中国大地上古来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是多元的;早在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分别进入了农耕社会;早在五六千年前,中国大地上就显露出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从地下史料与传说资料的结合方面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下史料可视为代数式中的“常量”,而主要取决于传说资料这个“可变量”:传说有和无、真与假的确定性,传说人物性质的确定性,传说人物氏族渊源的确定性等等。换句话说,倘若我们只是以讹传讹,无法确定哪些人物的确切存在或真实形态,无法确定他们的氏族渊源和传说的流布地域,

那么,将地下史料与传说资料相加的结果,不但不能正确说明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而且还会造成更多的混乱,甚至起到完全相反的作用。

这样,我们的论题又回到了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老话题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有还是无,是神还是人等等。坦率地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是个谜,现在很难认为哪一种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毫无必要。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以科学态度判定传说资料的基础上,联系考古挖掘的地下史料,确定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矛盾更少一些,更能令人信服一些,哪一种说法对于阐述中国的文明起源更确当一些。

研究古代传说,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世纪以来,老一辈史学家力求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重新研究传说时代的古史,虽然分歧较大,结论迥异,甚至有各种错误,但比起他们的前人来,无疑有很大进展。今天,我们的研究正立足于老一辈史学家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因此,对他们的是非得失进行清理,吸取其中的科学成分是十分必要的。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对古代传说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代表了一种值得重视的倾向。他们中一些人认为:我国传统中的三皇五帝都是人为的“编造”,甚至是某些人“信口瞎说”的产物。他们以为推倒了儒学经典中的古史系统,就打倒了儒学典籍的权威,对古史的研究就能趋于科学化。这些学者的努力,对于当时的思想解放,的确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并没有起到澄清其中混乱的作用,反而增加了新的混乱。其一,他们“推倒”的同时并没有建设(确切地说是没有来得及建设),除指出了传统的古史系统的“伪”之外,没有揭示出“真”的来。于是,中国殷、夏之前的历史成了一片空白,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就变得模糊不清。其结论自然不能为“以古为荣”的国人所接受。而且,当时国

际上出现了一股中国文明西来说的黑潮,这些学者的结论又被人们同国际上的无稽之谈联系起来,于是,遭到了长时间的严厉批评。这虽然不是他们的过错,但也不能说与他们某些结论的绝对化毫无关系。其二,他们的研究中,仍用传统的办法,对某些传说人物进行“合并”,而忽视了传说人物的氏族界限,从而不能不回到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一元论的旧路上。

不过,平心而论,他们的结论虽然是片面的、甚至有某些错误,但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一是他们对儒家典籍中古史系统的否定,打破了人们对儒家旧说的迷信,开拓了人们的思路,促进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史的思考;二是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个论断基本上符合事实;三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传说资料详加考证,按时间顺序排列、对比,其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科学的。时至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某些论著,对于传说资料大抵只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相比之下,我们对“疑古派”的科学方法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可惜当时以至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因批评其结论的错误而抛弃了这些积极因素。

在批评“疑古派”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肯定儒学经典的可靠性,主张凡《左传》、《国语》所载,都是传自古远的说法,都不能“轻易怀疑”,从而力图论证三皇五帝的真实存在。

应当肯定,这些学者完全出于一种高尚的情感,其动机在于肯定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千百年来,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在一些学者看来,倘若包括炎、黄二帝在内的古史系统被否定,我们岂不成了不孝子孙!岂不削弱了中华儿女及海外赤子的爱国之心!这种纯洁的动机自然无可指责。即如笔者自己,若干年来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到九十年代初的论文中也还是沿着传统的说法去思考问题,研究古史。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真正下功夫研究了先秦史料之后,我对传统的古史系统及个人以往的观点渐渐产生了怀疑,并发

现其中矛盾甚多，且难以克服。

从宏观上看，人们一方面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氏族林立”，另一方面又力图把当时描述成像后世的大一统国家一样，产生了那么多声名炫赫、功勋卓著、号令“万国”的古帝，这是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一。人们一方面承认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又力图把原始时代的诸多发明创造归于一两个“领袖人物”，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又一个矛盾。人们一方面肯定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又确认集诸多文明成就于一身的炎、黄二帝距今五千年，这是肯定我国有悠久文明还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它？

从具体的史料看，儒家的典籍果真具有不能怀疑的权威性吗？作为儒家正宗传人的荀况就曾批评他的师祖子思、孟轲之徒“往旧造说”，自己编造一些“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古说，然后“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①否定儒学经典的何独“疑古派”！即如儒家自身，也没有过分痴迷，我们今天又何必过于虔诚！被一些学者视为“古说”、“不能轻易怀疑”的儒家典籍《左传》、《国语》，其中正充满了无法克服的矛盾。诸如《国语·晋语四》中姬姓的晋国大夫司空季子认黄帝为姬姓之祖，但在《论语》中，姬姓的鲁国大夫展禽讲各国祭祀祖先时，周人偏不以黄帝为祖，这岂不是说周天子“数典忘祖”！这类牴牾之处甚多，我们以后还要具体说到。同一部《国语》，歧异如此明显，我们岂能含糊了事！岂能随意抽出一说作为“古说”！

再从坚持传统的古史系统的效果看，也不足以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无稽之谈。国人以炎黄为祖先足有两千年了，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人拉克伯里就曾接过这个话题，认为黄帝本身就是西来的，并煞有介事地说，黄帝是中亚巴克族的酋长，率族人东来，死于陕甘交界处的桥山；还说伏羲、炎帝等都是巴克族人。对于

^① 《荀子·非十二子》。

这类说法,我们似乎可以用“凭空捏造”一语加以否定,但反过来说,我们本身对炎黄等古帝的存在含糊其辞,似是而非,我们本身对炎黄的氏族渊源牵强附会,外国那些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人又何尝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捕风捉影!所以,对中国古代传说人物的肯定或否定,并不是批判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主要论据,关键是要使我们的结论经得起推敲。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

反对疑古派所执的最充足的理由是怕尧舜禹的黄金时代若打倒,就会影响到人心。骨子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假如我们要把中国上古的文化说得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子,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要失掉了。

这点感情虽是十分合理,动机却极纯洁,且是普遍存在的。好多成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免除不了。外国人带了这种感情来论中国事,无形之中就要把中国的民族史看得比他本国的格外不同一点,被误解的人自然也要想法子自卫。是非曲直,非特难断定,反愈闹愈纠纷了。^①

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察中国传说资料,对古代传说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都无助于正确阐述中国文明起源史。把古代传说与地下考古史料相加的做法,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现在还难以确定传说的真实程度和真实形态。

有鉴于此,本书试图从研究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入手,来探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

(二)研究的指导思想

研究古代传说是为了寻找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线索,而不是

① 《城子崖挖掘报告序》,1934年,《东方杂志》,32卷1号。

去编织新的神话。因此,有两问题值得一说。

坚决抛弃文明起源一元论应是本书的第一个指导思想。考古资料已经表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我们必须立足于这个基础上去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史。

文明起源一元论似乎是古今中外的“通病”。近代西方学者拉克伯里、安特生等人认为中国文明是西方传来的,或曰中亚,或曰南亚、南俄。在他们看来,人类文明同出一源。从他们的欧洲中心论出发,文明的源头即使不在欧洲,也必在其邻近地区。这种一元论的观点已为世界考古学的结论所否定。在我国内,一元论的文明起源说同样源远流长。《世本》、《帝系篇》可算是一元论最早的版本,我们姑置不论。即以太史公的《史记·五帝本纪》为例,一说黄帝代神农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并且,“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二说颡项“王天下”时,“日月所照,莫不砥属”。三说帝尧为天子时,“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至于帝尧,则“合和万国”。似乎中国古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家长制的国度,天下、万国听命于一人。

这些说法可信么?我们虽难遽断,但由甲骨文所载可知,时至商代,其疆域还大抵只相当于今河北、河南、苏皖北部一带,“而以河南、山东两省为主要部分”。商人对其周边部族征讨不断。^①至于周朝,有学者指出,其统治区域虽有扩大,但仍属族邦制的多元组合。由此推知,在商、周之先两千年之久的时代,哪有什么大一统的事实呢?能产生出若干凌驾于各部族之上的“天子”么?

今天,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人们虽然在理论上不得不承认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对古代传说的研究工作中,仍然使用着和往古一样的武器——中华文明一元论。人们千方百计去论证黄帝作为人间古帝、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真实性、可靠性,这显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方国地理》。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然谈不上科学,也无法揭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真相。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大地上距今四千多年以上的各种考古文化无不显露出各自的氏族特色,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是否可以“超凡脱俗”而不带有氏族印记呢?因此,本书研究中国古代传说,探究古代传说的性质、氏族渊源,正是为了打破一元论的旧说,还历史本来面目。

探索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还必须摒弃非理性的英雄史观。这是本书的又一个指导思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切成就是各部族先民在与大自然斗争中的经验积累还是几个英雄人物的发明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否应当以几个英雄人物为座标?这些问题在哲学领域中似乎是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在古史研究领域中却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一个时髦的说法是:文明成就虽不能归功于个别英雄,但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所体现的是广大先民的创造力和创造精神。这种“代表说”似乎避免了英雄史观的谬误。但我们仍有必要问一句:他们的这种“代表资格”是何时才获得的呢?我们不妨从史籍中作一番搜寻。

先秦儒家学派是“显学”之一,后世则成为中国的主流学派。但是,早期的儒家著作中见不到传说中英雄的发明创造事迹。《论语》中无黄帝只字,其他如炎帝、颛顼、帝喾等也一无所见。《左传》中黄帝、黄帝氏各一见,只言“黄帝战于阪泉”,“黄帝氏以云纪”,不及其它。至于帝尧,则是一个庸碌无为的形象,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这似乎可以认为,从孔子那个时代到战国前期,人们似乎还没有把他们当作英雄,也没有请出他们来作民众的“代表”。

道家人物是主张“弃圣绝智”的,更不会去塑造英雄。《庄子·胠篋篇》、《盗跖篇》中对古代社会的描述是比较合乎理性的,其中说:

当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